

朝華文庫 紀念叢書

# 力山完造

## 紀念集

上海魯迅紀念館 編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# 力山完造

纪念集

上海鲁迅纪念馆 编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内山完造纪念集 / 上海鲁迅纪念馆编. —上海: 上海文化出版社,  
2009

ISBN 978 - 7 - 80740 - 466 - 8

I. 内… II. 上… III. 内山完造(1885 ~ 1959) — 纪念文集

IV. K833. 137 =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158668 号

出版人

陈鸣华

责任编辑

周莺燕

装帧设计

蔡 惟

书名

内山完造纪念集

出版、发行

**上海文化出版社**

地址: 上海市绍兴路 74 号

网址: [www.shwenyi.com](http://www.shwenyi.com)

印刷

上海市印刷十厂有限公司

开本

890 × 1240 1/32

印张

8.25

版次

2009 年 9 月第 1 版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国际书号

ISBN 978 - 7 - 80740 - 466 - 8/1.557

定价

48.00 元

告读者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联系印刷厂质量科

T:021 - 65410805

## 编委名单

主 编：王锡荣

副 主 编：邱作健

编 委：（按姓氏笔画序）

王锡荣 王鲁燕 乐 融 乔丽华

李 浩 邱作健 施晓燕 秦海琦

蒋雅萍 缪君奇

执行编委：李 浩

图片整理：茅才龙



内山完造 (1885.1.11——1959.9.20)

# 目录

## 纪念·研究

内山完造与鲁迅的友谊 周海婴 / 003

放眼未来·真心相待·永远友好 [日]井上浩 瞿斌 译 / 017

内山完造与中国文化

——纪念内山完造先生逝世 50 周年 王锡荣 / 021

老板·上海的伯父·内山完造

——从儿岛祐市、智、亨、静子的记忆中了解的鲁迅和内山完造

[日]佐藤明久 瞿斌 译 / 031

附：内山完造逝世 50 周年纪念活动演讲实录 / 042

浅谈鲁迅与内山完造的友谊及其他 虞积华 / 047

“战斗的日中友好的先行者”

——鲁迅与内山完造的真挚情谊 周国伟 / 056

友情胜似亲情

——纪念内山完造先生逝世 50 周年 史伯英 / 068

内山完造访绍的一组照片 裘士雄 / 074

上海内山书店的文化沙龙：内山老板的上海观察

——漫谈家内山完造的思想与时代背景 [日]吉田旷二 王建华 译 / 077

鲁迅杂文的勃兴与“鲁迅亲日说”的破产 张梦阳 / 092

20 世纪 20 年代日中近代文学交流与上海内山书店

——以“支那剧研究会”及与田汉的关系为中心

[日]小谷一郎 王建华 译 / 099

# Contents

## 放射“一种异彩”的“漫文”

——读内山完造的《活中国的姿态》 凌月麟 / 113

内山完造：上海时期鲁迅与日本人交往的中介 李 浩 / 118

郭沫若与内山完造 邓牛顿 陈嘉冠 / 129

郑振铎与内山完造 陈福康 / 133

内山完造的两次“天堂之旅” 钦 鸿 / 137

内山完造与文艺漫谈会 江 枫 / 141

一个日本人眼中的中国国民性 顾红亚 / 153

中日文化的传播者——内山完造 虞 静 / 160

内山完造与鲁迅的十年情谊 骆 婷 / 168

丸善书店与内山书店 张铁荣 / 175

寻访日本的内山书店 乔丽华 / 179

## 内山完造文选

鲁迅先生 [日]内山完造 雨田 译 / 183

思念鲁迅先生 [日]内山完造 王孝宏 译 / 191

内山完造对鲁迅的回忆 [日]内山完造 吕元明 译 / 196

《花甲录》节选 [日]内山完造 卞立强 译 / 227

写给增田涉的两封信 [日]内山完造 小夏 译 / 236

忆母亲 [日]内山完造 [日]内山篱 译 / 239

《活中国的姿态》节选 [日]内山完造 尤炳圻 译 / 242

编 后 / 255

纪念·研究

---





## 内山完造与鲁迅的友谊

周海婴

内山完造先生是鲁迅的好朋友，也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。今天，我想谈谈内山先生与鲁迅之间的友谊。谈三点。

第一点，他们之间，是一种患难与共、终生不渝的友谊。

鲁迅与内山先生的交往，是在他生命的最后九个年头。那时上海的政治环境十分险恶。一方面，日本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，中日关系很紧张，1932年发生了淞沪战争；另一方面，中国的国民党反动政府加剧压迫人民，屠杀革命者，围剿革命文化。1930年3月，反动政府对鲁迅下了通缉令。这个通缉令直到鲁迅逝世也没有撤销。内山先生对这些都很清楚。通缉令下来时，就是内山先生请我们一家避居到内山书店楼上一个半月，那时我才半周岁。1936年7月，就是鲁迅逝世前三个月，他过去的一个学生李秉中，当时在南京国民党政府里工作，写信来说，他早想设法撤销对老师的通缉令，但不敢启齿；最近听说老师有病，因通缉令的关系，形同禁锢，希望老师能同意解除通缉，一切手续由他办理，绝不敢有损老师丝毫的尊严。那时鲁迅大病初愈，接到信就散步到内山书店告诉了内山先生。内山先生在《忆鲁迅先生》一文里是这样写的：

先生用很大的声音叫着“老板”，这种过分的突然，使我吃了一惊。因为这是病后的第一次。

“老板，今天的精神很好，所以试着出来走一走。前几天从南京来了一个客人。他是特地跑来探问我的，是个从前的学生。今天又从南京寄来了一封信。信里头说着这样的话：‘先生的通缉令自从发表以来，已经有



1933年初夏，鲁迅与内山完造  
摄于上海千爱里内山寓所前

数年之久了。因为先生生病，所以，我打算把那命令取消。自然，跟先生的人格有关系的事情，我是不会干的，但恐怕做了之后为先生所申斥，所以想先得到先生的谅解。”

我就问先生：那么，你是怎样回复的呢？

“我因为很寂寞，就写了一封信回答他。大意是：谢谢你的恳切，但我的余命已经不长，所以，至少通缉令这东西是不妨仍旧让他去的。”

从内山先生的回忆里，可以看到他对鲁迅的人格、鲁迅的思想，都是十分敬佩的。一到危难之际，总是立刻伸出援助之手。除通缉令那一次外，后来又遇到过几次危险的事：1931年1月柔石被捕，1932年1月淞沪战争，1934年8月内山书店两名店员被捕，当时都由内山先生帮我们找到避难的住所。而内山书店，也就成为鲁迅与朋友来往，与革命者及国际进步人士会晤的一个安全可靠的联络点。内山先生对鲁迅，对中国革命者的这种友谊，在当时是遭到中日两国黑暗势力的反对的，可以说是一种危险的友谊。保持这种友谊是需要人

格和勇气的。所以内山先生对鲁迅，对中国人民的友谊，是日本人民高尚品德的一个象征。

第二点，他们的友谊之花，结出了中日之间思想文化交流之果。

鲁迅与内山先生结识之后，很快就从个人之间的友谊扩大到了两个民族之间的思想文化交流。我们从鲁迅和内山先生合作的事业中可以看到，即使在当时中日关系如此严峻的形势下，两国人民也可以通过思想文化的交流达到相互的了解和友好。内山书店本身，就通过经销世界各国的书籍，实现着国际思想文化交流的作用。我们可以从鲁迅的日记和书账里看到，鲁迅到上海以后购买的图书，绝大部分是通过内山书店买的。然而内山先生所做的决不只是这一点。当时中国政府当局是反对国际间进行进步文化交流的。鲁迅的书和文章遭到查禁，迫使鲁迅不能不用化名进行战斗。被禁的书在中国书店不准卖，内山先生就在他的书店里卖，还通过内山书店发往外国。鲁迅的一些重要的揭露国民党反动政府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文章，是通过内山先生介绍的日本朋友在日本发表的，使日本人民也能够听到中国人民和中国作家的声音。鲁迅编辑的瞿秋白遗作《海上述林》，也是内山先生设法在日本印刷装订的。内山先生还将研究中国文学的日本学者介绍给鲁迅，在鲁迅的帮助下把中国文化传播到日本。增田涉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个。鲁迅还和内山先生合作举行过多次中外版画展览，有一次是在千爱里内山先生家中举办的。

当然鲁迅与内山先生的事业不同。鲁迅是思想家、革命家、文学家；内山先生是一位商人，一位有文化的商人，一位伟大的、有远见、有勇气的商人。他们成为终生不渝的朋友，是有共同的思想基础的，那就是他们都想爱中日两国的人民，希望两国人民互相了解，互相友好。内山先生的著作《活中国的姿态》，就是为了把他所了解的中国介绍给日本人民而写的。鲁迅在为这部著作撰写的序言中说：

著者的用心，还是在将中国的一部分的真相，介绍给日本的读者的。但是，在现在，总依然是因了各种的读者，那结果也不一样罢。这是没有法子的事。据我看来，日本和中国的人民之间，是一定会有互相了解的时候的。

鲁迅与内山完造先生，就是在那些艰难的日子里，致力于中日两国之间的思想文化交流，播下了两国人民相互了解、相互友好的种子的。

第三点，他们的友谊，是在黎明前的黑暗中为未来的日中友好合作之路开辟了道路。

鲁迅与内山先生，为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合作做了先驱者的工作。然而鲁迅没有看到这个中日友好合作的新时代的到来。鲁迅逝世不久，日本帝国主义者就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。内山先生看到了新中国的诞生，他是在偕同内山真野夫人来华参加国庆 10 周年庆典，抵京后第二天因脑溢血逝世的。那时中日两国人民间友好往来方兴未艾，但政府间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，所以也还谈不到两国的全面友好合作。

今天，先驱者在黑暗和荆棘中为未来的中日友好合作开辟的道路，已经洒满阳光，而且道路愈来愈开阔，一直通到了 21 世纪，通向永远。让我们携起手来，沿着鲁迅和内山先生的足迹，在中日友好合作的大道上共同前进。

## 内山书店

“不卖血”，这是父亲对内山先生的评价。即是说，他不出卖朋友。作为一个日本人，在那个年代是难能可贵的。这里就我所知，对这位可尊敬的前辈的生平和身后情况做些补充。

内山先生开设的内山书店，我幼年时去得较多，可说是相当熟悉。单开间的门面，左右有两个橱窗。店里经常出售最新书籍，橱窗中的玻璃上不时更换着招贴广告。读者进店内仿佛来到了书籍的海洋之中，书架一直顶上房顶，每排每架，满满当当，丝毫不留空隙，几乎把所有能利用的空间都利用了。售书实行开架制，高的可达顶层，低的可取中层书籍，读者可以自己上梯取阅选购，店员毫不干涉。书店中间，特设新书台，陈列新到书籍，集中醒目，方便读者、寻觅近期书刊，便于浏览选购。这些书籍大都是洋装的外文版本，当时我因年龄太小，全看不懂，所以到底都是些什么内容现在全无印象。不过每次来到书店以后，总要爬上高梯，居高临下，俯视一切。俨然成了一个“盖世英雄”。

这似乎也没有遭到过父亲的呵止，有时到他起身回家时，才招呼我下来一同回去，这个印象总是历久不忘。

在内山书店逗留，除了可以任意攀登的木梯，还有两样东西在我的记忆中一直存在，不能淡忘。这就是夏天放在门口的茶桶和冬天摆在屋内的火盆。

30年代的上海，有些店铺夏天备有茶桶。有的用大缸，有的用木桶，也有用铁皮焊成的洋铁桶，外装两三个水龙头，并备有简易的竹质或搪瓷水杯几只，供劳动者临时休息解渴饮用。内山书店也不例外，门口也有这样一座茶桶，在夏天为劳动者施茶。父亲与内山书店的“施茶”措施不知有何关系，也不知这种关系始于何时，后来我看他的日记，在1935年5月9日项下，记有“以茶叶一囊交内山君，为施茶之用”，看来至少是赞助的。看了这条日记，使我模模糊糊地想起，有时父亲远从绍兴嵊县购置茶叶十至二十斤（大概即所谓“一囊”吧），或者即为此用也说不定。大概这类山茶叶经泡，投入桶内，茶味能保持到一定时间，足能帮助劳动人民解渴之用。当时因为自己年幼，不懂这些事情，也没有向父亲当面问过，所以只能是一个猜测罢了。

上海夏天酷热，冬天则又变得很冷，但一般店铺，店堂内并不生火。内山书店却不是这样，因为那里经常有人选购图书，有时还有“漫谈”活动，所以生有炭火照顾来客。冬天我随父亲到内山书店时，就见他和完造先生在低矮的圆形瓷炭盆边围坐，盆内架一只三腿圆架，上坐茶壶，冲饮日本宇治特产清茗。我无事可做，对拨弄炭火发生兴趣。用铁筷（尾带金属链条）拨夹火炭，大放阵阵暖气，驱赶室内的寒冷，使大家的脸颊热得通红。

父亲单独带我去书店的机会不多。往往是父母两人携我同去。要说购书，我在这里没有买过书。我想起另一件事，有一次，从这里又转到另一家中国人开的旧书店，看到的书籍不再是厚厚的日文书和其他外文书，而是可以识得一些字的中文读物，不禁兴高采烈，赶快挑了几本，要求买回家去阅读。谁知尚未开口，却看到父亲现出一副从未见过的极不高兴的脸色，便放下手中浏览的书籍，让母亲领了我跟他一起很快离开这个书店。甚至连他已经挑选好的书籍也放弃了。当时我心里纳闷，不知出了什么事。事后，母亲向我解释，说是旧书太脏，有些是病人出售的，放在书店里又是什么人都来翻阅，小孩子抵抗力

较弱，容易传染上疾病，所以父亲才那么着急。

## 两个不解之谜

父亲去世后，我们搬离虹口区，便极少和内山完造先生接触。信件、书刊不再从书店转递，店员也没什么来往。日军进租界，没收英美等对日宣战国的财产，内山分配到南京路一家三四个门面的书店，此处原是中美图书公司。这家书店规模不小，一楼售文具、杂志，二楼售书，都是外文洋装书。内山接管后调整架位，排列成西洋夹东洋的，并且还跟虹口内山书店一样放置了木扶梯，便于读者选挑书籍。由于供电不足，店堂平时就阴沉沉地点了洋蜡烛，顾客又稀少，以致与南京路的繁华商业呈强烈的反差。据说内山完造对此店并未下力经营。内山的《花甲录》里讲：上面来“一道让内山书店接管中美图书公司的命令。所以使我十分为难。由我管理，我不喜欢这样做（因战胜而扩大书店）。所以，让长谷川和中村二人去经营了。”看来，内山完造毕竟是基督徒，对“战胜”国有他自己的看法，这从抗战胜利后内山返回日本后的言行可以证实。母亲在日本宪兵队遭受七十六天磨难，日寇严刑未能得到什么口供之后，迫于社会舆论要释放母亲。为了掩盖其罪行，不直接从宪兵队放出，而是转移到沪西76号“调查统计局”，由那里取保释放，并要由中国人开的店铺作担保。母亲回答没有相识的中国店铺，只认识内山书店。她内心想，日本人无理抓我，现在要放，我让日本人来作保，证明你们抓错了。76号开始不允许，双方僵持了一阵，觉得人不是他们抓的，扣留下来不好向舆论界交待，只得让母亲打电话请内山先生来保。内山请示了宪兵队，出面作了保，母亲才于次日离开那时被人们视为魔窟的76号。

过了两个月，76号发信要母亲去“谈话”，要出去的人照“我们这里的规矩，把朋友介绍进来”。母亲的回答是：“我一直呆在家里，不敢和任何人来往，别人也不来看我了，哪能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？”

又过了不久，大约正是春夏之交的时候，母亲接到内山完造的通知，邀她某日下午到虹口“六三花园”喝茶。母亲对此百思不得其解。那段时期我们和

内山没有什么往来，76号的问话，没有达到“把朋友介绍进来”的告密、出卖同志朋友的目的，是不是又想要什么新花样，要通过保人内山完造下达些什么？母亲和我商量，既然保人让去，看来是躲不了的，不能以装病或者什么别的借口推托。母亲想了一下，让我陪她同去，也好有个回旋余地和托辞。

到了那天，我们乘了有轨电车到达虹口，走到“六三花园”已经比约定钟点迟了少许。见内山先生正在张罗，还要出席者签名，他见到我们母子俩，目光似乎一怔，迟疑了一下，像是想不到你们竟然会来。他从入口处的桌上，拿一条红色名签，替母亲佩在胸前，又看到我，找不到空白无名字的条签，寻了一条上面写着“陶晶孙”的，翻过来填上我的名字。我随意向里望去，熙熙攘攘半屋子人，都在高谈阔论。认识的人很少，似乎有夏丏尊先生，母亲告诉他们都是些滞留上海的文化界人士。我们不得不缓步进去，稍作点头，算是招呼。我嫌这枚胸条，故意把自己名字翻过去，使“陶晶孙”三字露在上面。屋里和母亲招呼的客人把目光移到一个孩子的“大名”上，却是那位当时颇遭微词的文人，忍不住放声大笑。内山完造听到这笑声，踱步过来，显得有点尴尬，又不便表示什么。我戏弄完这一幕，取下佩条，随母亲离开了会场，算是“到过了”。估计内山也是遵照上面什么意图，通知母亲去，母亲也到了，证明没有离开上海，算是给了担保人面子。内山完造没有提出什么希望或者任何暗示，因此，这个哑谜只能由知悉内情者来解释。我当时一步都没有离开母亲，是可以这么讲的。也许这真是一件“××××之谜”吧。

第二个与内山先生有关的不解之谜，也是发生在抗战期间。虹桥路万国公墓父亲的墓碑，上面镶嵌着烧瓷头像。不知何时，这像被人破坏，且敲得很有技巧，沿脸孔周围用细槌击凿，正好是当中面容那部分失去了，四周却没有大的裂痕，不像有人因泄恨而猛力打击，或者被顽童以石块敲砸所致。是行家里手小心翼翼地把整个瓷像面部取走了。问题是这样做的动机究竟是什么？如果从善意分析，也许是为鲁迅墓的安全着想，以此掩人耳目，才费了这番苦心。母亲在一篇文章里，依据那时的世道人心，有过上述的猜想。

后来，市面比较平静了，万国公墓的管理虽仍不如前，倒也收拾了破烂的门墙，对整个墓园也稍做了修整。这时有朋友告诉母亲，父亲墓碑上那块被敲

掉的瓷质画像，又完整地按原样复制烧了一块，重镶在碑面上。这位无名仁人是谁？真令人诧异。有一次在某场合，问了内山完造先生，他一口否认。又过了一段时期，母亲又向内山书店的老店员、唯一的一位中国雇员王宝良打听，问他这件事是不是内山先生所为，王没有正面承认，也没有强烈地否认。我想，这谜底已经不难解开了吧。

## 内山的晚年

日本投降后，内山完造先生在上海的财产被没收。这时他的夫人内山美喜子已经去世。因此1947年12月被遣返回国时，他是赤手空拳孤零零一个人走的。

这里有一个事实，需顺便说明一下。日本有位叫吉田旷二的作家，在他的著作《内山完造的肖像》里讲到，日本投降后关闭了上海的内山书店，内山完造只身遣返回国，“考虑资产的分配，店员的今后生活以及自己的前途，老板（指内山）让会计开了账目、资产的分配方案，把店里的全部资产和负债额列成表。把给日本、中国店员的東西都做了安排，还从店的资产中给鲁迅夫人一百五十令洋纸。”这最后一句，与事实并不相符。

真实的情况是，日本投降后，有一天内山先生到霞飞坊来，适巧母亲和我都在家，也许那天恰是星期日吧。内山先生从布包袱里摸出三只匣子，当面打开，交待清楚，请母亲代为保管。一匣是刻画蜡纸油墨的多种工具，有粗细铁笔，画虚线的几种滚轮，约十二种。另二匣是日本货自来水笔，派路脱牌（Piolet）每匣一打。今天看起来价值不过几百元罢了。随后，他行色匆匆地离去了。不久，也许是遣返前吧，他来告别，并把笔和刻蜡纸的工具都带回去了。由此可见，当时内山先生很困难，而一百五十令洋纸是非同小可的数目，他那时有这个能力赠送吗？我记得的是，内山先生确实让中国店员运来过一百五十令洋纸，但那是折价卖的。母亲为此和我议论过怎样筹划这笔款子，其中一部分纸还让给了某一二个书店。因此我以为内山先生是以这笔卖纸的款子用作店员解散费的。那年我16岁，自信已有足够的记忆力了。我的分析是：日本战败，所有动产、不动产都属于逆产，是不允许移动变卖的。内山完造委托店员把纸运来，必然